******J I A N G S U U N I V E R S I T Y**

**外 文 翻 译**

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生产

**Uneven Development：Nature,Cpa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学院名称：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业班级： 马克思主义理论 硕研1601

学生姓名： 穆昕

指导教师姓名： 付清松

指导教师职称： 副教授

2017年10月

《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和空间生产》

导言

这本书讨论的是政治的地理学和地理的政治学。它试图考察两种知识学的传统，而直到最近，这两种传统都不怎么懂得相互取长补短，如果这本书的内容和表述是理论性的，那么它的而动机也是相当直接的。随着资本的活动，过去20多年所发生的地理空间重组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剧烈，在观察当下世界的时候，我们再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去工业化以及地区性萧条、城市绅士化与超大都市的发展、第三世界工业化及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民族主义强化与新的地缘战争等等，这些并非是一些孤立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更加深刻的地理转型的征兆。就其基本任务而言，这本书的目标是要在理论上揭示驱动这种地理空间重组的逻辑。

第一种传统即是学院地理传统，它给我们提供关于地理空间和环境的正统概念，以及地球表面上的空间关系的相对分析。由于受新康德历史主义学派的长期催眠，学院地理学在20世纪60年代更换了其18世纪时的那块门面，而代之以历史的、更为彻底的实证主义特征。尽管也受到了一些挑战，但那些建立在绝对空间上的抽象观念仍然支配着这种传统。空间（以及时间）被视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地标，一个场域，一种无限、普遍而又不变的盒子，而物质性的事件就发生在这个盒子里。所以，在这一传统看来，除非受到普遍的而物理规律和力量的作用，否则空间是没有理由发生变更的：人类活动不会重构空间；它只在空间中重新安置物体。透过这种哲学透镜，空间重组的迹象只能被视作在毫无关联对的各级空间上所发生的诸多毫无联系的过程，其原因和结果自然也同样毫无瓜葛。这种透镜太过粗糙，因此，真正的模式只能被折射在它的碎片当中。

第二种传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分析。同地理学传统相比，马克思主义理论明显具有历史性传统，这也是它的众多优势之一。马克思主义试图阐明，一个社会当中特定时期的具体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是有具体的偶发过程所历史地形成的，而不是什么假想的普遍性力量如人的本性）造成的。不仅竞争、市场、经济增长、利润动机都是历史上的偶发现象，而且连它们所采取的形式也都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本身而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大优势是它看问题的关系性视角，它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一个统一（并非总是和谐一致的）的整体，而不是由各种碎片粘连而成的混合体。这些优点使得马克思主义传统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构格外敏感。但正是在这种历史敏感上的所得，导致其在地理敏感上的所失。原因或许在于，尽管它坚持历史方法，但同样倾向于认同那种传统的认为空间与社会没有关联的资产阶级观念，只有在涉及到对城乡分离、国际团结的必要性等进行分析的特殊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传统才挣脱了这种资产阶级空间的束缚。所以，尽管这种传统拥有某些透视当代地理空间重组的理论资源，但它始终还是欠缺必要的地理敏感性。

为更加充分地把握地理空间的重组，一些研究者开始致力于推动地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两种传统的融合。总体而言，这一努力的焦点建立在如下几个问题之上：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地理学？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具体模式和过程的特征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进一步变化？围绕这一焦点的探索推动着两种传统都发生了重大的进展。就地理学而言，它促使哲学透镜将历史作为焦点，从而全面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其中人类社会创造者他们自己的地理。就马克思主义而言，它获得了双重的机遇，既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拓展到地理领域，同时又能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由此，社会景观的自然和空间基础都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得到解释。

围绕资本主义地理学方面已经展开的大量研究都在详尽地考察不平衡发展的过程，这已渐成趋势甚至是一种时尚，但是因为过于时髦，所以它才像所有流行事物那样很快走向浅薄。例如，我们会发现，地理学家宁肯将不平衡发展视为一种普遍的和非历史的过程，而不愿将其看作是平衡发展的永远不可能性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所说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尽管具备敏锐的历史眼光，马克思主义者也同样表现出这种浅薄。因为不平衡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的拓殖而言太重要了，所以它反而被人简化为一种常识，成为一个尽人皆知的口头禅和到处被拿来应景的万金油。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地理的标志性特征，这个要点不仅仅是说资本主义不能平衡发展，即由于偶然和意外的因素，资本主义地理发展呈现出某种脱离一般平衡过程的随机性倾向，而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结构上的而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由此造成的地理模式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完全的决定性意义并由此是独特的。我试图表明，就其最基本的含义来说，不平衡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内在构成和结构的系统性地理表达。

占据了地理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传统所交叠的立场之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就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方便的法门，从而判定资本主义地理学的具体特征。以此种方式进行讨论，不平衡发展的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地理学的。但是，我们不能一头扎进对不平衡发展逻辑的深入考察当中，而无视我们可能深层次上遭遇到风险。这不单是资本主义对地理造成何种影响的问题，更是地理如何为资本主义效劳的问题。因为，除了基本的地理学问题之外，不平衡发展理论同样也关乎政治学：景观的地理构型如何帮助资本主义获得了幸存？因此，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视之，这不但是一个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和增强其有效性的问题，更是一个对20世纪资本主义何以幸存提供开拓性的全新解释的问题。就地理学传统来看，今天，尤其是对美国那些迫不及待地寻找一切企业机会的来说，结果居然是戏剧性的。流行的地理学洞见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压缩的世界当中，精良而又廉价的交通系统削弱了地理空间及其差异的重要性，传统的地区身份正在被抹平，一言以蔽之，我们已经摆脱了地理的限制。在对不平衡发展理论进行追溯的时候，我想指出的是，不论流行洞见包含了怎样的真知灼见，真理却在其反面。地理空间已史无前例地被提上了政治和经济议程。“历史所占据的地理枢纽”（布热津斯基在其著名《大棋局》以及《大决择》中，继承和发扬了地缘政治学鼻祖麦金德于《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阐释的地缘政治思想，明确提出亚欧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中心的观点，认为美国要继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必须控制亚欧大陆，尤其是“全球的巴尔干地区”）这一思想比麦金德当年所能设想到的更具有现代性内涵，也更为深刻。

不平衡发展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遗产。在着手进行当前的这项研究之前，有必要对目前的分析中与所谓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相吻合的那些方面加以说明。曼德尔坚持对不平衡发展思想进行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谱系学考察，他认为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起源问题，没有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能像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思想那样在资产阶级当中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和传播。此论不乏真知灼见，但也有夸大之嫌。不过，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内，这种（不平衡）发展思想确实没有得到很好的推进，它在1920年代托洛茨基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关于国际主义同“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争论当中凸显出来。在这种语境中，不平衡发展是一种政治概念，指阶级斗争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反对世界资本主义斗争的不平衡。同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思想方面一样，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这种解决争论的方式在后来压抑了不平衡发展进程的其他思考。

事实上，作为一种具体过程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最初在列宁那里得到了深度讨论，他试图在经济和地理上为这种过程进行初步的概括。尽管他在后来的分析中不时的论及这一问题，但是他早期富有启发性的工作并没有得到完善。1905年革命以后，不平衡发展思想作为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被阐释出来，这就是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数量超过工人阶级并且尚在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托洛茨基在同斯大林的政治斗争中所发现并重新界定的正是这一概念，所以，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不平衡与综合发展律”（law of 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就显然源于托洛茨基这一传统。托洛茨基的惨败导致这一概念的经济与地理内涵在后来被彻底清除，从而陷入混乱。但由于这一概念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相关联，从而能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在托派运动中幸存下来，用来描述阶级关系的发展状态和分析革命形势。

如果说人们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关注与这种马克思主义遗产具有某种关联的话，那么这种关注更多的则是1960年代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趣的广泛兴起，以及对现实过程的地理敏感性普遍增强的结果。而如果说这一过程的结构及其重要性在80多年前尚未被识别出来，那是因为直到那时以后，资本积累的地理模式才发生急剧的变化。在狭义上，本书所指称的不平衡发展，实际上是一个20世纪才出现的现象。因此，对不平衡发展理论的追溯，除了地理学与政治学传统之间的对话之外，还要涉及到另一种对话，即它同样需要在对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理论分析与走向20世纪尽头的现实资本主义之间展开一次历史性对话。

不平衡发展的逻辑是十分特别，它来自于资本主义所内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即生产水平与条件在造成分化的同时朝向均等发展。资本被持续地投入到人造环境当中，以便获得剩余价值并扩张资本自身的基础。但资本同样不断地从人造环境中撤出，从而向别处移动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回报。生产资本的物质形态的相对固定性对于不停流动的价值资本而言，仅仅或远非是一种必需。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资本主义更为基本的矛盾在地理上的表现。

导致这种景观的模式是显而易见的：一极发达而另一极不发达（undevelopment）。这种现象在多种空间规模上都会发生。依附理论、中心-外围理论以及各种不发达（欠发展）理论都关注到了这种过程。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却仅仅集中在了全球这一空间规模上，而且不平衡发展地理学维度并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简言之，他们未能提供一个有效地理解资本主义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或许，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理解地理学的障碍主要不是因为我们忽视了资本的作用，而是我们普遍具有的那种对待空间的根深蒂固的偏见。不平衡发展理论必然要在各种规模上考察空间与社会过程，然而我们将空间要么视为一种活动场所，要么看做是一种容器的流俗之见，导致我们很难摆脱那种空间与社会机械统一的观念，空间被视为社会的“反映”。因此，这就需要从根本上转换视角。因为，尽管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我们在概念上实现空间与社会的统一存在着极端的困难，然而资本却显然已经在日常实践层面上实现了这种统一。其结果便是资本依自己形象而实现的空间的生产，故而，对这一思想的探讨将有助于不平衡发展理论对空间与社会的统一问题达到更全面的认知，其理由在于，资本不只是一般地生产空间，它还在现实中生产出那些能将不平衡发展连贯起来的空间规模。

实际上，空间生产立足于一种更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之上，这一过程听起来更有唐吉歌德的味道，它撼动这着我们对那些不证自明之物不假思索地予以接受的传统。自然的生产不仅为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而且，它事实上还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实结果。自然的生产这一思想对我们的触动如此之大，原因在于它毅然决然而又公开地反驳和抛弃了那种认为自然与社会相互分离的传统而又神圣的观念。我们习惯上认为自然是纯洁的，先于、外在于社会的，或者将其视为一种宏大的宇宙，人类在其中只不过是写渺小而简单的边角料。但是，我们的这些观念统一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是资本主义迫不及待、趾高气扬而非羞羞答答地挑战者那种自然与社会分离的认识。

资本为持续地积累并控制更大规模的社会财富，总会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上帝不会留下一块没有用的石头，不存在任何未被改变的原初的自然关系，也没有那种生物从来没有受过干扰。在此意义上，自然、空间和不平衡发展问题被资本绑在了一起。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生产具有的过程和方式，这在我们讨论自然生产那部分时会被更加明显的揭示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将会把这部分的讨论还原为对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讨论。我不打算为这种观察视角上的拟人主义倾向而道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社会被置于自然界的中心，我们只有首先承认这一现实，才能恰当地解决由此造成的问题。

本书的论证过程还是一目了然的。讨论完自然的意识形态（第一章）之后，我随即对另一种可能的自然关系观念展开初步探讨，集中关注自然的生产（第二章）。如果说这前两章的内容有些抽象或与主题不太相干，这或许部分是因为我们一直习惯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我希望这不会让读者感到气馁。在第三章，我讨论了自然与空间的关系，并追索出导致资本进行空间生产的强大动力。第四章主要讨论平衡与分化的基本过程，以及它们同资本积累和循环的关联，这将为专门讨论不平衡发展一般理论的第五章奠定最终的基础。第五章的论述主要以前几章在空间和自然问题上的出的相关结论为基础，同样也运用马克思资本主义相关分析。因为如果大家能利用马克思的相关分析（尤其是《资本论》）中所蕴含的空间维度和意义，那么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基础就是现成的。这样，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会先从更一般的哲学范畴开始，同时在它们能胜任于不平衡发展的实际研究之前，还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整理。

在展开不平衡发展理论过程之中，我将遵循马克思所运用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经“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般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易言之，这种假设绝非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抽象，而是在历史上实际发生着：这种假设“表明了过程的界限，......因此总能不断接近现实的情况。”不论是继承自封建主义所形成的历史遗留，还是来自一种理想的存在，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不论是在其地理景观上还是作为资本的一种内在要求----在今天都表现得格外醒目。本书就是试图对不平衡发展得以产生的那些过程进行理论分析。

编后记：

地理学的起源

Ⅰ深度空间和残酷的地理学

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研究关于发现地质时代的历史中，他提到了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一个著名的结论 - “没有一个开始的遗迹 - 没有结束的前景” 。约翰·麦克菲把的短语“远古时间”作为他重要的一个研究发现进行宣告。在十七世纪，人们发现的时间延续到过去的6000年，然而在十九世纪初，科学意识到的时间被延伸了数百万年。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告诉我们“远古时间是如此陌生，我们只能把它理解为一种隐喻”。他论述了“地理英里”的隐喻，在他的论述中人类历史只有最后几英寸；在瑞典地质时间的记载中，在南极寒武纪期间出现了蜗牛的痕迹，而且这个痕迹还继续前进到了马尔摩；在麦克菲自己的隐喻中，凭借地球的历史可以估量英国古老的英院子，即从国王的鼻子到他伸出的手的尖端的距离，其中所有的人类历史可以被皇室动动手指而抹去。通过“将时间视为地理”，空间就变成为时间意义的隐喻承载体。空间同样具有最抽象的时间描述；时间通过时钟指针指在空间布置中运动而变得可测量和具有意义。

早在二十世纪就已经开始出现深度空间的概念,或者说至少出现了其社会构造的概念,但直到二十世纪即将结束时,这个基本的发现才变得较为明显。通过深度空间这个概念，我并不是想要简单地表明绝对空间的无限性，虽然这一无限的范围正如在光年所测量的宇宙的范围那样。牛顿建立了空间概念，这一概念在物理学、天文学、空间科学和宇宙学中被进一步探索、定义和完善。相反，我提到的地球空间的相对性，从全球到当地的所有规模的日常生活空间，以及使用多琳·梅西的隐喻，不同层次的生活和社会景观沉淀在彼此之间的建筑。深层空间是典型的社会空间；它是通过社会意图融合的物理范围，列菲费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最具代表性。在社会理论的新兴空间术语中，地理时间更能恰当地表示空间的流体意义的隐喻，反之亦然。

深层空间以及它的产生概念都是真实存在的。作为一种方法来进行后期的概念性讨论，我想讨论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两件事情，通过这两件事情来了解“深层空间”的意义和即时性。第一个事件是美国经济危机的问题。在1987年十月股市崩盘的前一年，正当里根政府还继续在为八十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欢呼的时候，一位银行家描述了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深刻后果，并将这种结果视为一种地域性的大屠杀。随着银行的过度曝光，每个人持有大量的坏账，实际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纽约化学银行总裁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S.Johnson）预测一个迫在眉睫的大战：“有可能出现一种噩梦般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严肃地预测道，“每个债权人都在掠夺地球，试图找到其它的抵押品。这种全球性的掠夺并没有在一年后出现，而且金融体系实际上作为“金融崩溃”的遏制船只（如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约翰·佩兰所说的）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这不仅仅是马斯·约翰逊对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核心危机的认识，我们的银行家从萦绕的噩梦中认识到全球资本的根本空间建设和将在努力“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造成的地理破坏，至少在目前的私有财产经济规则下是这样。世界将被不可阻挡的经济力量洗摧毁，因为华尔街上的工作簿停止了累计; 同时最大的村庄被掠夺，因为经济制度已经没有了意义。

1989年整个东欧都在进行的自下而上大规模的和平革命，在这个期间“深度空间”的概念得到了丰富。1989年11月9日，东德人对柏林墙的进行肆意破坏，这一事件标志着东方新政治的铁幕开始了。在西方许多人把这种行为解释为对资本主义民主的热情和长期的认可，在这些事件中的空间意义阶层是多种多样的。这些无声的革命在西欧开辟了真正新的政治空间 - 到目前为止苏联革命程度比较少 - 但是这些新开辟的政治空间也是有限的。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群众斗争只处于萌芽状态，拆除东墙的行动在波兰无处不在，对于这些新的政治空间的限制只在于想象，其组织有效性和治理仍然可能继续前进。但是就另一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革命是通过华沙条约和各国军队的不干涉而实现的，或者他们积极干预是代表反对派的- 新政治空间的局限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建立在军事等级制度的重建的基础上的，可以参与社会重建或其他的，或者是让他们自己发挥核心作用。

事实上，早在1990年初东欧大部分地区过早结束的革命表明，至少在短期内，无论是公众想象的政治局限，还是军事干预的限制，都不可能是决定性的限制。捷克斯洛伐克正朝着社会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匈牙利和东德国选择了更加保守的政权形式，大量的迹象表明，造成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这一现象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市场密不可分。波兰作为昔日的工会是最激进的保守主义国家，象征着团结，同时追求最无耻的资本利益。这是所有吗？ 很快这就将成为了东欧大部分地区的共同抱怨。

1989年的东欧革命的政治结果不仅仅只是区域性的。虽然他们可能影响东欧每个家庭，工厂和街道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结果却是全球性的。从柏林拍摄的数小时令人震惊的电影中可以看见，布什政府和国防部面临着国会要求大幅度削减高达3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工人在国防工厂中的工作受到威胁，在全国范围内构成了第一个愤世嫉俗，难以持久的思想防御路线，一如既往的是，“美国工人的工作”应该解释为“美国公司的利益”。在地缘政治方面，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都欢呼起来，华盛顿政府正为寻找新的全球敌人而局促不安，最后终于在巴拿马下车。玛格丽特·撒切尔，狠狠地击败的官方政权; 她以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向苏联社会党秘书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受西方领导人的赞扬，因为他是自己国家迄今禁止的“民主化”的作者）完美的展示了她的阶级色彩，同时劝告东欧的群众“慢慢地做善事”，免得全球和国家的“稳定”被破坏。

重新统一的德国的希望，使过时的国家和地缘政治本质主义重新复活，而且也恢复了法国，英国特别是美国统治阶级的国家和地缘政治本质主义。但是，在现实中，德国的统一与地缘政治没有什么关系。在IBM和ICBM的时代，简单的空间适应性是有限的结果。这是一个经济问题;“美国世纪”的衰落，使用亨利·卢斯的1941年的话（现在看来相当乐观），将在德国重新统一（在同盟的欧洲之内）的情况下取得更快的进展，速度与来自日本的已经普遍的竞争相比，翻了一番。然而，在生产，资本，劳动和商品市场以及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的东欧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真空，那些充满危机的资本可能会被吸入。资本的跷跷板对东方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在许多乐观商人的眼中，东欧的开放将是对全球资本的经济肾上腺素的刺激，一个新的世界的征服，一个空间的解决方案，一个新的空的经济空间，从以前抵抗的全球资本到了地理经济边界之外。随着廉价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匈牙利被称为“金矿”国家。他们的希望是，对东欧进行的大量投资能为东欧提供足够的机会来解决或至少减少过度生产的危机，同时，正如化学银行的约翰逊那样，也担心的东欧的财务负债。

但是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情况。将非硬通货，不同工资率，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融入欧洲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是十分艰巨的。然而，这些安排是有效的，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具体国家重新建立相对封闭的经济和政治边界，东欧将也更加紧密地融入全球市场。在这一方面，在传统意义上诊断东欧和苏联的社会和他们作为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巡回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很可能被证明是有预见性的。然而，在1989年以后，这却是悲观主义的论点。基层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反抗是东欧起义的真正根源，他们期待政治和经济上的替代方案，使之成为一种压制性的国家经济。但正如霍普森先生指出的那样，东柏林人没有打破柏林墙，只是煽动私有化的住房或私有化的医疗保健改革，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因此，在东欧目前的结构中，协调空间的生产仍然不是一种经济逻辑，而是在同一时间分离但又更加紧密相关的是日常的政治斗争：对政治权利的斗争 类别，族裔，性别和国家条款; 争取就业住房和消费的经济权利; 对环境条件和社会服务的斗争; 并争取农村发展。经济主义(但几乎没有经济分析）的谎言不是哲学批判，而是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戏剧。1989年东欧革命历史重要性最终将会按照相互交织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斗争（在东欧集团内部，以及把这些社会融入到已经不稳定的全球资本主义中）的方式来进行衡量，这次革命将重建当地、国家和全球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它们的一部分。

斯蒂芬·凯恩认为我们的空间和时间经验的根本基础在后来进行了戏剧性的重组。差不多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另一种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空间的意义在社会建设中得到了彻底的体现。。这不仅仅是一个的全球性事件。富人和无家可归者在整个西方的城市中心重建的同时，逐渐蚀刻了全球和地方的深层空间的轮廓。通过从硅谷到台北的新工业园区的去工业化和再投资方式，这些地区的生产规模都进行了同样的重组。美国大平原的农业地区在经济和金融、环境和气候危机的生产过程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态，导致一些人主张将平原回归到布法罗公地。而在欧洲，1992年一次危机的到来将有可能解散国家规模的组织。

但是就全球范围而言，空间的重新配置是最需要的。在所谓的第三世界里，这种强化的空间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毁灭性的。虽然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见证了几个第三世界经济体及其强国（新工业化国家）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积累，但也证明了其他地区的日常生活遭到了空前破坏。更加深刻的是，如果不那么常见，那就将是全球资本对这一地区的彻底改写，所需的资本会被系统地否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第三世界的债务引发了经济危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贫困异常，甚至没有奢侈的债务。20世纪80年代，非洲的私人投资已经下降了25%，而且随着对东欧的资本重新分配，非洲的私人投资将进一步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4个国家仅为美国积累了48亿美元的债务。在非洲这些地方，世界上的国际机构如：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与和平公司(Peace Corp)和国际发展机构(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等国家机构都有共同承诺，那就的是：给予非洲国家现代化、资本流入、稳定的政治、以及帮助其实现生活条件的改善，只要它们效仿西方资本主义模式。那些从非洲农民的日常生活中翻译过来的，高水平的进步的经文已经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变成了邪恶的地域。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这条信息经历了不可避免的误译，这是现代化理论本身的一部分，代价是数百万人的生命。这就是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力量。

II物质的空间和隐喻式的空间

与地理空间的物质重构同时地出现的理论是：“关键社会理论中空间的重新分配”。艺术史学家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表达可能是最为完整的，他认为事件的空间“同时性和延伸性”现在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现代通信手段的范围：现代权力规模：世界上必须接受的个人政治责任程度：世界已经不可分割的事实：世界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规模的剥削。所有这些都发挥作用。 预言现在涉及地理学而不是历史学的预测; 它是空间而然不是隐藏我们结果的时间。今天的预言只需要知道男人和女人，因为他们的不平等表现在整个世界的各个方面。

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埃德·索亚精辟地编纂并阐述了福科和普朗查斯，萨特和阿尔图塞，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工作中关于空间理论的重大发现。福柯发出疑问：“空间理论开始于伯格森还是在他之前？”空间被当作死的，固定的，不言而喻的，不动的。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繁殖，生活，辩证。他遵循福柯对空间的认识：“现在的时代可能会超过空间的时代。 我们在同时性的时代：我们在并置的时代，近和远的时代，并列的，分散的。”一方面指出社会理论的刻板历史主义，另一方面，索亚还指示大多数二十世纪地理的内在的孤立; 在过去的十年中，他发现了两者之间即将和解。社会理论努力地把握深度空间理论，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运动已经达到了努力重新连接空间的社会话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理论。对于索亚（Soja）来说，这种重新连接基本上涉及一个“空间化本体论”，它将平衡从历史主义和一个全新的，哲学基础的，空间化的社会变革话语中分离出来。

或许在地理话语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空间理论来自于1984年弗雷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提出的“适合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政治文化模式必然会引起空间问题作为其根本的组织关注”这一理论。在凯文·林奇提出的不太可能的来源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建议，一个“认知测绘美学”是合适对焦这个文化政治。从地理上看，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理论研究无疑是最有影响力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哈维都在设法建立一个“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如果像詹明信（Jameson）所说的那样，后现代主义中存在“新的空间性隐含的”，这可能解释了哈维的后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广泛的兴奋，它试图连接后现代主义已经发挥出来的文化词汇， 随着资本主义晚期重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詹明信和哈维之间的平行，来自不同的空间重新确认，是毫无疑问的。

但让我们暂停一会儿，这些声明的全部内容不会逃脱我们：

“现在的时代超过所有空间时代。”（福柯）

“预言现在涉及地理而不是历史的预测。”（伯杰）

“与我们自己的情况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模式必然会提高空间性作为其基本组织关注。”（詹姆逊）

如果索亚（Soja）对于历史主义的主导地位是正确的，那么很多其他人(在不同的文章中）已经表明这个主导地位似乎是不可辩驳的，然后这个作家和许多其他人宣布的对空间和地理的转变不是小事件。这种空间的重新定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如何比较沉默与这样一个深远的历史和知识的实现似乎已经实现了？ 谁引用福柯的话，向我们解释了现在的样子空间的时代？ 伯杰所需的地理预言在哪里？ 谁开发了基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政治斗争的基本空间战略？哪里有惊人的论文宣布的空间和政治实质的“认知测绘”或地缘历史唯物主义？

在深度时间的介绍性讨论中，我们发现古尔德和其他人将时间可视化为地理。空间是充满意义的时间的隐喻镜子。在这里，我想，这是一个线索的沉默，与空间的再次被欢迎。无论政治和智力在社会理论话语中是如何重新确定空间的现实，显然对空间的理解有着非常不同的解释。对于那些在地理学方面有所了解的人而言，空间的物质性（社会和身体构成）是这样一个中心假设 - 这本书中的假设是空间的物质它几乎没有挑战。这绝不是排除对空间的替代理解，而是排斥特别是文学理论，然而，空间主要是作为比喻。在这些话语中，物质空间不再存在;它的实质性对于他们来说是毫无问题的（绝对空间），如果有任何有价值的问题，它就不会产生。有趣的问题出现，而不是从个人，心理，社会和概念“空间”领域，领域，语境，领域，猜想 - 其中人类思想的戏剧和人际关系发挥出来的范围。

当然，“主体立场”，“概念空间”，“理论空间”，“争论空间”，“谈判空间”，“意义空间”，“意识形态空间”等后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语言在纯粹的隐喻语调中有效地提及空间。 “映射”似乎涵盖了从一个测试到另一个测试的几乎每一种可能的翻译。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这里詹姆逊不经意地暗示了一个答案，当他承认自己的空间隐喻：“认知映射”，他告诉我们，“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码字”阶级意识“。是对空间化政治的承诺真的只是比喻的吗？如果这对一个明确的政治思想家如詹姆逊来说是可能的，那么，文学和文化话语可能会导致其重新确认，以及一些社会和空间理论家急切地采取这样的话语作为撤退一个明确的对立政治，空间将被缩减为隐喻，其实质性仍未实现。

然而，我更倾向于认为该理论确实是连贯的 - 不仅仅是隐喻的 - 也许尽管博学的隐喻在知识和政治议程上宣布了地理空间，但我们仍然对丰富的可能性感到困惑;确实存在对空间化政治的新生承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空间上的一个丢失的话语，很难通过一个强大的空间隐喻的掩码来清楚地看到 - 难以理解物质和隐喻空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我相信这是詹姆森自己的工作。詹姆森对我的分析（和我认为许多其他根植于空间的地理概念）的洞察和快感在于他对城市空间远景的广泛解读，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动荡的表现。这正是从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开始的项目的范例，如果詹姆森只是昏暗地理解城市景观作为社会和建筑环境的重组，他做了大量的精辟的连接提供了城市视觉尚未实现的相关性。隐喻的使用是他成功的核心。詹姆森遇到的批评的不对称同样显而易见。从政治和地理的角度来看，批评者对他对文化和经济的混乱，对城市重组文学不熟悉以及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到来时机的错误感到遗憾。然而，从更多的文化界来看，主导的批评似乎是他有弹性的正统，正如他现在承认用隐喻来解释“认知映射”。

什么是纯粹隐喻的空间概念的危险？首先，正如我们对物质空间的概念通过隐喻来增强一样，因此空间的隐喻使用不可避免地涉及物质空间；一个是从另一个内部构建的，所以我们不处理粗糙的二元论。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中，空间通常作为不言而喻的入侵：作为站点，地面，让历史移动的稳定的基础。它定义了一组固定的协调，使历史变化连贯一致。因此，该关系是不对称的;历史是自变量，地理依赖。正是由于这种空间概念作为地面（或者作为单独的地面的组合），空间隐喻总是吸引人的;空间用于动画时间，给时间灌输可以衡量，测量，赞赏空间的死亡的生活。无论什么空间隐喻的力量，特别是揭示当代世界的碎片化的统一，他们精确地通过加强空间的死亡，因此通过否认我们适合分析那个世界的空间概念。隐喻是固有地并置;它揭示了一个真理，将它断言为另一个。如果我们要超越空间的重新确定，那么，为了寻求空间和社会之间的和睦，就必须填充隐喻和物质空间之间的概念深渊。

在这种光环下，有意义的是设想深空间，将固有的社会过程和产生的空间结构与来自任何给定固定形式的空间的最表面的折射结合。 因此，隐喻和物质在深层空间是不可分离的，但仍然是独特的。 在隐喻主导我们对空间的概念的程度上，是固定形式的后一种折射告诉我们; 空间的隐喻占用是“真实的”，但它们隐藏了深层空间的生命，如同一面镜子隐藏了它后面的世界一样有效。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空间的物质和隐喻意义之间的翻译规则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发掘空间的物质和隐喻意义，以及如何发掘它们以促进发展 的空间化政治？

III生产的规模

亨利·列菲弗尔在他定义和高度原创的作品《空间的生产》中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空间概念进行了最复杂的探讨。如果在他早期的工作中，空间的隐喻和物质概念有时是不自觉地混合的，那么在这本书中将有一个更加明确的理论来分离出三种空间：真实或社会空间；理想或心理空间； 以及隐喻空间。他批判福柯等人的理论空间和实际空间，心理空间和真实空间。但是他维护心理空间理论，因为他把理想和真实的空间设想为互为前提，而他敏锐地感觉到沉溺于心理空间的自我奉承中：大多数即使不是所有的作者在心理（因此是新康德式或新笛卡尔式）空间的条件下都能够舒适地自我保护，从而证明“理论实践”已经不再是西方知识分子的自我中心思想 - 很快就是一个完全分离的，精神分裂的意识。

同样，空间隐喻与物质空间的概念相互牵连; 它们是不可避免的构成意义的手段，但只有在它们吸收空间，从而将其概念降低到抽象领域时才成功。 空间隐喻在马克思意义上的拜物教兴盛，并重申“抽象空间”。

亨利·列菲弗尔有一种感觉，当代资本主义的空间是一种比喻。借用哈贝马斯所描述的现代主义的说法，我们可能会说，随着20世纪资本主义的出现，空间变得“主导但死亡”，对于莱费勃尔而言。空间的死亡是通过它在资本主义的手中变得抽象而产生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世界，积累的逻辑和战略，国家的压迫统治，扩展抽象空间，同时与日常生活的景观断开，同时破坏现有的差异和差异。空间是“跑进地面”。“国家粉碎时间，黑格尔式回到自己的”。黑格尔空间确实死了，因为它是通过国家的纯粹概念的强加，但同样的道理，它是主导的。空间在双重意义上占主导地位，它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生产者和再现者，同时也是压迫性暴力的来源：“抽象空间的生产”的一个方面是“一种概括性的隐喻，适用于历史和累积领域，将他们转移到暴力被掩盖在理性和统一理性被用来证明暴力的空间。

亨利·列菲弗尔认为，资本家的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三位一体”在一个“三方面的制度空间”中具体化。 空间就是：

全球是主权空间，同质性，拜物教和差异的缩小;

分离是分隔脱节，并建立地方，以方便控制或谈判;

分层是在动力和象征意义方面。

对于亨利·列菲弗尔来说，抽象空间的强制同质性和暴力是永远不会发生的。 如果空间经历了从绝对主义到抽象的一种大幅度下降，历史空间不会消失，而是不断地被再循环。 不断的斗争塑造了空间的生产，这种斗争的目的 - 勒费弗称之为“战略假说” - 是打败那些意识形态，促进抽象空间，扭转空间抽象，并产生不同时间碎片的空间差异：

现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阶级斗争都时刻存在空间之中。

事实上，正是斗争本身阻碍了抽象空间占据整个地球，并打破了一切差异。只有阶级斗争才有能力区分，产生不是经济增长策略，“逻辑”或“系统”固有的差异，也就是说，不是由这种增长所诱导或不能接受的差异。阶级斗争的形式比以前更加多样化。当然，它们包括少数民族的政治行动...。基于空间的战略假设既不包括所谓的“欠发达国家”的作用，也不包括工业化国家及其工人阶级的作用。恰恰相反，ts的基本原则和目标是将离散的方面，他们不同的倾向和因素的统一汇集在一起.它意味着在一个时刻动员差异（包括自然起源的差异，每个生态学倾向于强调隔离）;制度，国家，地点，民族，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

需要一个新的理论代码，这个新的理论代码将重建和汇集对立差异作为与政治实践相联系但不同的知识系统。空间的替代概念将被限制，直到空间可以产生不同的，并且可以将差异作为有意的战略指导解放生产的空间。

虽然第一次写作近二十年，亨利·列菲弗尔的关注点在于差异作为政治战略的关键，（虽然在阶级斗争的标题之内），他对我们现在称之为不同主体立场的包容和肯定，是对围绕差异的社会建构建立的当代政治理论的广泛同情，尽管事实上他的大部分工作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框架，亨利·列菲弗尔明确表示，支持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如果最近这项工作的中心论点围绕着阶级，种族和性别的整合，不同主体立场的谈判，避免瘫痪相对主义的多方位论的理论化 - 这在一个仍然开放的分析框架中提供了“空间”的干预，避免整合，并培育政治赋权 - 如果这些是中心问题，那么似乎很明显，亨利·列菲弗尔 的空间生产的概念可能提供一些可能的路标。空间是一种通过绑定以及分离，包括以及排除，以及精确地通过绑定到生活的关键空间概念的手段，他提供了一些工具来解码空间隐喻，“脚本”我们的努力整合，谈判和理论化不同的“立场”。这是“空间的生产”的光辉。它要求对隐喻的批判，但同时为连接非常不同的经验提供了基础，这些经验通过隐喻部分地被理解。

更具的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中最严重的错误，正如许多人现在想做的，马克思的论点特权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有直接的剥削经验。我们可以承认其他主题的定位（无论是定义还是范围）都是独特的，在这个意义上是特权的，但他们有不同的方式的特权。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的特殊特权是能够从双方理解剥削。 通过扩展，可以认为，根据种族和性别的其他形式的压迫，例如，他们自己的特权作为其主体位置的组成部分。 然后有一个反对特权的谈判，这可以部分通过相互批评来进行，但是亨利·列菲弗尔提供机会看到这些是在更广泛的社会空间范围内谈判的，因此也是这个空间的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并不立即明白空间生产意味着政治战略。 这种翻译还有待完成，部分原因是亨利·列菲弗尔从来没有逃避哲学批判的地形，还有是因为在他自己的空间史上，有一个偶然一直伴随着他们。 翻译仍然需要做出一个哲学批判，连接到地理空间的生产，正如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整合了空间的社会和物理结构。 我想提出一条论据，既提出了在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早期讨论，同时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

作为在第5章中推导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关键一环，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采取和实施的地理框架。通过建立一种地域框架，平等和差异化的相反趋势可以被取而代之。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空间中出现了三个主要尺度，即城市，国家和细化讨论的地方。 虽然一般来说，地理尺度被认为是一种暂时的地域固定的辩证法理论化为资本内部，虽然这些论点可能仍然处于适当的抽象层次，生产的规模和政治的规模比这样理论化的建议更加复杂。 规模是反对的项目，因为它是资本的项目。

不同的社会产生地理尺度与空间生产的整合。我们有一套谦逊的语言来讨论历史差异，当涉及到地理差异时，我们的概念是贫乏的。事实上，规模是空间分化的最基本形式，从家庭的分界到全球的分界。如果一方面，全球空间是市场的经济关系和排除，削弱或鼓励市场的政治斗争的产物，家庭的空间主要是再现社会关系，其中性别差异和性别为主的斗争。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认知映射以其直接的意义，被认为是一个严肃的政治战略的程度上，其第一项任务可能是建立区分彼此的边界。我们还能怎么知道要映射什么？如果这不是任意做的，一个规模理论 - 这是一个社会生产规模的理论 - 是一个先决条件。

地理尺度是政治的，正是因为它是技术，据此，事件和人们，在字面上，“包含在空间之中”。另外，规模划分了空间或者人们“占据”为自己创造的空间。因此，在规模上，抽取了空间的压迫和解放的可能性，它的死亡，也是它的生命。

同样，规模提供了空间意识形态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达：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区域主义和一些形式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因此，规模的产生和表示位于空间化政治的中心，即使在许多政治话语中，这种空间斗争往往隐含在命名术语，命名地方的论证中，在边界争斗中也是明确的。 让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涉及城市内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在其他地方，纽约市的高档化住宅最初集中在靠近中心的社区。曼哈顿下东区在1974年至1974年衰退结束和1977年财政危机缓和之后受到严重攻击，1980年代房屋资金压力加剧。随着联邦资金在里根政府下的虚拟停止，纽约市政府基本上采用高档化作为纽约的住房政策。除了直接针对住房康复的方案，城市采取了两点战略来“收回”下东区，一个被缺席地主摧残的社区，这两个战略分别是大规模投资和削减社会服务。战略的一个分支涉及一个邻居安全再次为白人中产阶级。第二个分支涉及“清理”城市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人口越来越多地使用的公园，作为药物业务的场所，以及广泛的当地居民。城市觉得它失去了对这些空间的控制，并明确指出特别是汤普金斯广场公园。

各种社区团体组织反对警察宵禁，旨在夺回公园 - 以亨利·列菲弗尔的名义返回国家控制的抽象空间，斗争于1988年8月爆发，当时有400名警察对示威者发动暴动。警方在几小时的骑兵和警棍攻击之后，就把公园给丢了，而这个地方立刻成为了城市的租户，住房和无家可归的人的焦点。起初，市长将公园描述为一个“污水池”，他加入了巡逻员的慈善协会主任，指责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寄生虫，毒品，光头党和共产党人的骚乱。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一般不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所知，将暴乱称为“B大街上的阶级斗争”。在几天内，在公园内几乎没有组织的无家可归人口以及新的和现有的租户和擅自占地者团体和组织内建立了一些组织联系。从下东区的公园开始，新一轮的抗议活动开始了，到处都是“汤普金斯广场”(Tompkins Square)，这是新的口号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市政府只是冷静地对抗擅自占地者和住房示威者，市长的谴责已扩大到包括整个下东区，而不仅仅是公园。新的歧视性公园规则被采纳，然后匆忙搁置，经过十六个月的警察的防御骚扰，公园是一个棚户区的住房，在200和300平米之间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无家可归的人的避难所。 1989年12月，随着单身人士热度上升，以及无家可归的人的存在妨碍了其他人使用公园，全防爆警察搬了进来，在公园里分散无家可归的居民，丢弃人们的棚户和任何救出私人财物，并将垃圾堆在十辆垃圾车中。相互攻击之势愈演愈烈。

这个例子的重点是突出规模在控制空间斗争中的作用。它开始于公园斗争但是在地理上其规模扩大直到它将整个社区定义为政治扩张的一部分，以包括不同的群体和种类的组织以及不同的位置。它表明，空间政治不仅将事件发生的隐喻付诸实践，而且真正的竞争涉及决定斗争规模的权力的轨迹：谁定义了这个地方（亨利·列菲弗尔的片段）和它的边界。它还表明，成功的斗争通过“跳跃模式”抵抗抽象空间。由分形空间组织成一个连贯的规模，连接的地方，努力提升自己到下一个规模层次。因此，理解空间生产作为在全球规模内生成一个嵌套层次结构，以及如何构造这些层次结构的重要性。还有问题。 特别是，一旦事件发生，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如何将过渡组织到更具建设性的任务？ 这在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发生的斗争只是在一个非常初级的层面，部分原因是外部攻击的持续威胁，政治组织的内部分裂，以及资源的普遍缺乏。

IV历史的终结还是地理起始？

随着总统和总理和足球教练似乎使用每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在人性或历史的领域，可能有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国务院官僚声明，在1989年的喧闹之中，实际上，历史已经结束。弗朗西斯福山说，拆除东欧官方共产主义和东西方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束标志着“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和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在自己的否定中的成果。斗争无疑将继续存在，但他们将是本地化和周边的；历史对于未来的承诺不多而且无聊。

比文章本身更有趣的是，它以对黑格尔的忠实，揭示了所有人看到的哲学家的政治机会主义，是历史的结束收到的非凡的货币。从形成对空间重新确定的观点，可能不难发现福山在解释东欧的中心的明显绝望背后的理由。

历史终结的说法是极其愚蠢的。在东德记录了一个反斯大林主义的笑话：历史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大家都知道，未来的历史是固定的; 它是不断变化的过去。换句话说，1989年的暴乱在四十年中首次揭示了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人民创造了历史。它再次代表着数百万东欧人的历史的开始。 这种争论的傲慢的种族中心主义也不能让任何人注意。只是因为美国和苏联领导人已经调整了他们的核威胁，几乎没有理由剥夺津巴布韦农民，巴勒斯坦起义的历史，确实纽约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努力争取机会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尽管它是反动的唯心主义，但是人们是可以看到提案的逻辑。在黑格尔感受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国家的兴起，马克思重申了“历史时间作为革命时代”的某种优先地位。如果东欧的官方共产主义的失败被认为标志着革命时代的结束（尽管有一个明显的历史事实，即这些社会都没有共产主义革命 - 但是历史只是一个想法），那么历史时间似乎已经结束了。事实上，马克思本人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这个逻辑，但是黑格尔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对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结束标志着一个社会前史的结束；改变不仅针对公民，而且针对抽象的社会法律类似于自然法则，经济法则只是从推翻资本主义开始。历史的完成的社会和政治决心只是从推翻资本主义开始。 事实上，亨利·列菲弗尔自己写了一本名为《La Fin de l'Historie》的书，比《空间的生产》早4年，他总结说：“因为黑格尔的空间把历史的时间带到了尽头，而空间的主人就是国家。”

然而，今天空间的重新确定不依赖于任何黑格尔的理由，无论是以福山的教义理想主义或亨利·列菲弗尔的更重要的参与的形式。这是一个更加确切的事情和更直接的政治。二十世纪中叶地理学的死亡确实遵循自我造成的创伤，正如索亚提及的那样，但它也代表了对实际事件的反应：空间加速湮灭的时间; 从战后（尤其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优势点看，全球，区域和城市/郊区领域的空间条件的趋势均衡使得已经不发达的地理知识对当代事务日益边缘。现代资本主义，正如马歇尔·伯曼告诉我们（在另一个充满隐喻和奇妙地揭示资本主义地理的工作）出现了某种“底线的虚无主义”，它结合了一种地理上的虚无主义，在空间的建造以及在破坏中。

因此，社会理论中当代对空间的重新确认在历史上与后战后世界中地理空间的重构和重新塑造是一致的，并不是偶然的。这也不是对少数社会理论家的深刻认识。美国国会于1987年决定庆祝“地理意识周”（现在是一年一度的活动），作为鼓励被认为对国家经济和军事利益至关重要的地理教育的一种手段。 虽然不那么令人信服，但可能更有影响力，前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在“福布斯”杂志（“资本主义工具”）中签署了一份十年末的社论，敦促哈佛和其他美国大学“带回地理学” [美国]可以从这些惊人的变化在全球事务中发生的任何意义上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从地理开始。

因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复兴几乎没有问题。它涉及对谁控制地理知识，谁使用它以及如何使用以及如何产生和为谁产生的基本政治反对。可能得到支持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理解空间化政治的颠覆性。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派可以期望那些决定开放一个多样的“主体位置”的白人，工人阶级和经济学人都是是永远被征服的支持一个赫拉克利特世界与一切的流动。唯一阻止这种立场在时间上从赫拉克利特的困境到但丁的地狱，其中的主体被谴责永远转变和最终无法实现的位置 - 没有原产地，无目的地的前景 - 是保证的地面， 空间隐喻的丰富性。赫拉克利特要求在一个地方站立。但是，如果这里要求的空间隐喻不再能被无辜地使用，如果空间不再站立，则没有自动地理追求锚定或掩盖主体位置;地域太珍贵，不能以这种方式盲目牺牲;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必须以更直接的政治方式寻求，而不是走私死者中未经检验的隐喻。

从最流行和最哲学的话语来看，争夺空间的斗争是极其政治化的。但是赌注绝不是学术性的。在史诗电影《费兹卡罗多》(Fitzcarraldo)中，导演维尔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在世纪之交的秘鲁和巴西拍摄了真实的事件，描绘了欧洲早期开放亚马逊(Amazonia)的努力，提取其资源(尤其是橡胶)，并以上层欧洲社会的形象来解决内部问题。自然的文化产物是令人敬畏的。电影开始于1896年的亚马逊剧院 ----这个歌剧院 位于进入亚马逊丛林100英里的马瑙斯。恩里科·卡鲁索和贝恩哈特在电影开幕式上演出。因为河水是“污秽的”，所以马瑙斯的先生们把他们的衬衫和领子送到里斯本清洗。在歌剧中，他们的马用最好的香槟来喂食。菲茨卡拉多（由克劳斯·金斯基扮演）是一个粗略的爱尔兰冒险家，他的名字来自菲茨卡拉多的本地发音。他热爱歌剧，他从亚马逊河划桨1200英里到伊基托斯去看望卡鲁索：“这将是丛林中最好的歌剧”。菲茨卡拉尔多由自然的物理和文化生产驱动。在他拥有的一个稀有的地图上，他注意到亚马逊河，乌卡亚利和帕奇塔的两个北流支流，流动得如此接近，以至于几乎合流; 只有一个狭窄的领土将它们分开。乌卡亚利顺利地到达了秘鲁的未知的亚马逊丛林，但由于一系列的急流而无法穿透，这使得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没有被利用。但是帕奇特阿河是可以通行的。

菲茨卡拉多（其先前的失败包括“跨安第斯铁路”）痴迷于横跨地球，他的雄心壮志使他开辟了一条通往秘鲁阿马佐尼亚的河道，用于橡胶的开采。他曾经发誓“我要移动一座山”。在拥有有了船员和铁河船后，他从帕奇特阿河启航，很快遇到著名的食人族黑瓦罗人，在丛林里的河岸上的那些看不见的黑瓦罗人不停地大喊，声音越来越大并且在威胁着他们。菲茨卡拉多称他们是“裸驴”。当一场袭击迫在眉睫时，他使用在船上的留声机上演奏卡鲁索歌剧，而黑瓦罗的印地安人也被安抚了。印第安人不仅仅是缓和，他们航行到船上，谨慎地加入到他的队伍中，还答应帮助为伟大的白人上帝移动这座山。将船拖到马鞍上并连接水棚，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技术壮举，而且菲茨卡拉多预计会收获有巨大的财富。在最远的欧洲探险之时，他遇到了两名传教士，他们讲述了少数敢于冒险的欧洲人的命运。传教士问菲茨卡拉多探险的目的，但他没有回答。在传教士追问时，他注视着黑暗的丛林，静静地说：“我在规划着一些地理上的事情。”

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根本地理项目。现在也许还为时过早，我希望不要太迟，因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本身应该是在“计划某种地理上的东西”。

尼尔·史密斯

1990年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